

# 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分析框架

崔唯航

##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刻把握历史规律、时代大势与人民期盼,提出一系列具有高度辨识度、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性的重大命题,其中包含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不仅把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而且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系统梳理、深入提炼并有效转化这些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将其有机融入学术研究、学科建设,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分析框架,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 标识性概念:推动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范畴的有效转化

标识性概念是理论体系中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核心术语,承载着特定的价值立场、历史逻辑与实践指向。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从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范畴,是一场术语的革命。例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发展路径的描述,更蕴含着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周期性、碎片化局限,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贯通,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范畴,关键在于以严谨、系统、深入的方式对其进行创造性阐发。

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梳理与厘清,明确其内边界、历史脉络、理论前提及实践根基,并辨析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在哲学层面可探讨其本体论预设,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个体发展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等;从经济学视角可分析其制度安排与增长机制;在社会学层面则可探讨其社会结构特征与治理逻辑,研究微型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只有把这些具体内容讲透彻,概念才能避免流于空泛。

其次,把这些概念嵌入学科理论框架中,转化为可具体研究、分析和比较的学术议题。例如,政治学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细化为人民参与的广度、政策制定的深度、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维度,进而构建评

估民主质量的指标体系;法学可从法治中国建设中提炼出良法善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重要学术议题。

最后,使这些学术范畴回归现实问题,在具体情境中展现其解释力与生命力。例如,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方案;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公共生活的新环境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能为算法治理、平台责任、公民数字权益等新兴领域指明价值引领与制度建设方向。

### 原创性思想观点:推动从价值引领到方法论自觉的系统跃升

原创性思想观点是理论创新的灵魂,其核心在于对重大时代课题的敏锐捕捉、深刻洞察与系统阐释。它绝非简单的概念重组,而是立足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演进规律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揭示。以“两个结合”为例,它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规律的本质认识,更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与理论自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同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原创性命题,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彻底超越了GDP至上的发展观,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转型的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将这些原创性思想观点有效转化为具体学科的分析框架,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认同、政策认同到方法论内化的深刻跃升。研究者不仅要理解、认同其思想观点与价值导向,更要将其内化为审视问题的视角,解析材料的科学工具以及评判结论的价值尺度。以“两个结合”为例:历史学可以借此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打破形而上学史观对中国历史叙事的桎梏;哲学领域则可深入发掘儒家“为政以德”、道家“无为而治”、法家“循法而治”等思想资源,寻找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的内在契合点,从而构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哲学理论体系。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原创性思想观点具有跨学科属性,能够跨越传统学科边界,形成新的问题域。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单纯的国际

## 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 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影响力

鲁俊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前沿问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条件下教育发展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扩大共享,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重塑全球教育形态。不久前,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国际议程、规则和标准制定。面对机遇与挑战,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影响力,既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打造高能级国际交流旗舰平台,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一方面,依托现有高端国际平台,做优做强“人工智能+教育”专属品牌板块。充分利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等国际化平台,策划举办高规格的“人工智能+教育”主题边会或专场论坛,通过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教育创新成果展览、发布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最新案例等环节,将中国的先进理念、成熟技术和落地产品集中展示,吸引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会,形成产业界与教育界跨界融合的国际效应。另一方面,在“建机制”上下功夫,推动国际交流由“事件驱动”向“机制驱动”转变。在国际交流旗舰平台牵引下,牵头组建跨界的“人工智能+教育”国际组织,设立秘书处等常设机构,建立定期会晤、联合发布、信息共享的

运转机制。通过常态化的机制安排,使国际交流走向“深度对接”,持续扩大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朋友圈”。

积极推进政策沟通与标准对接,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标准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和博弈的制高点。提高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必须跨越单纯的技术输出,深度融入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在政策沟通与标准对接上展现中国担当。一是主动搭建政策对话桥梁,凝聚“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国际共识。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伴随着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学术伦理等风险挑战,各国对此监管尺度不一。可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制,积极发起或参与人工智能教育全球治理的政策对话。通过政策层面的坦诚沟通,能够减少误解,有效防范误判,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二是全力推进标准互认与联合制定,提升中国在规则制定中的实质性话语权。聚焦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接口规范、教育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智能教学终端技术要求等关键领域,鼓励国内头部企业、科研院所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对接。不仅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被国际采信,也要倡导由中外专家联合起草制定新的国际标准。通过主导或参与标准制定,将中国在海量教育数据沉淀中提炼的重要实践转化为全球通用规则,从而在底层逻辑上增强“人工智能+教育”的中国印记,实现由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引领者”的转变。

大力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培训,推动优质资源“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落脚点在于实实在在地惠及各国人民,特别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跨越智能鸿沟。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合作提质增效,坚持“授人以渔”,以能力建设和资源出海双轮驱动。一方面,精准对接国际

关系学范畴,既要求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深刻触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责任分配等制度设计,以及文明对话中的哲学基础等问题。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真正释放这些原创性思想观点的理论潜能,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原创性与世界性。

### 原理性理论成果:推动从系统接受到范式创新的深层整合

原理性理论成果是对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思想观点的有机融合,本质上是对特定领域内在逻辑与演化规律的系统概括和理论表达。例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均已形成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些成果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思想引擎,更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富矿。

实现原理性理论成果向学科分析框架的深度转化,不能停留于简单阐释和机械套用,而应将其作为支点,撬动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性革新与范式升级。比如,在政治学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突破传统治理范式的局限,强调制度执行力、治理效能与人民获得感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创新推动学者转向构建包含治理绩效评估、制度韧性分析、社会回应能力提升等多维要素的新型分析框架,为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研究提供全新视角。在法学领域,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法学研究范式从静态条文分析转向动态实施效果评估,构建起涵盖法律实施、文化认同、制度效能的立体化研究范式。这种转化不仅拓展了法学研究的理论维度,更提升了其回应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与原理性理论成果之所以具有强大解释力、引领力和持久生命力,根本在于它们不是从西方理论范畴中演绎出来的,也不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之中,是在亿万人民的创造性探索中概括、提炼、升华而形成的思想结晶。把这些思想结晶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可操作、可延展的分析框架,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学术范式变革,也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环节与关键路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需求,大力开展人工智能师资与治理能力建设培训。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短板往往不是缺乏设备,而是缺乏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师队伍和懂技术的教育管理者。应整合国内师范类顶尖高校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培训资源,设立关于国际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的培训中心。通过实施“走出去”培训与“请进来”研修相结合,为合作伙伴方培养一批懂技术、会教学、善管理的本土化“种子师资”,激活其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坚持质量优先,系统推动优质“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平台走向世界。在资源出海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国内中文资源进行翻译,而是要结合目标国的课程标准、文化语境和宗教习俗进行深度本地化改造。重点推动国产高质量教育大模型、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智能自适应学习系统等“硬核”资源出海,并提供全周期的技术运维支持。以优质的资源供给和良好的使用体验,让海外师生切身感受到中国“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温度与效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中国教育科技的全球美誉度,培育忠实用户群。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

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

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坏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急难愁盼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当,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

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目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

带领群众,聚的是人心。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众志成城。主心骨绝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唯有沉到一线,和群众坐同一条板凳上,真听、真看、真问,才能把群众的“金点子”变成破解难题的“金钥匙”。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对“主心骨”有误解,有的包打天下,结果干部在干、群众在看,拧不成一股绳;有的习惯发号施令,把“带领”变成了“命令”,群众并不买账。让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关键在带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领导干部冲在前头,群众自然跟上来。群众要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英雄,而是“始终在场”的依靠。领导干部是带领者,但带领不是命令,更不是包办。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是担当,平常时候“俯下身子”是功夫。真正的主心骨既要能独当一面,更能汇聚合力,让群众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尝到甜头。只有千群同心,方能其利断金。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

## 提升精准度、均衡度、参与度

# 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王永友

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修养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在促进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主动下沉上下功夫,从政府文化供给、群众文化需求、社会组织协同、政策机制保障、技术方式创新等多方面发力,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人民群众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锚定需求导向,提升公共文化供给精准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结构深刻变化,呈现出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鲜明特征。面对持续增长的文化需求,必须进一步弥补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短板,推动文化供给与需求升级相适应,加强优质文化的有效供给。要提升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健全文化需求精准采集机制,运用大数据采集、基层调研等方式,动态把握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文化偏好,了解基层群众缺少哪些文化资源、基层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餐”。例如,浙江武义打造“共富百花园”,基层群众实现手机便捷“点单”,建立起文化需求及时响应机制,实现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高效化、智能化配送,使基层群众更数字、更直接地享受到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全面提升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效能。丰富优质文化资源的种类、形式、内容,大力扶持原创精品创作,培育精品公共文化项目,推动线上线下文化场景融合,发展数字文化、文创产业、沉浸式体验等新型业态。

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域推进、成效显著,但城乡公共文化发展仍不均衡。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文化壁垒,构建城乡一体、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供给格局,从根源上破解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难题,让优质文化资源平等惠及城乡群众。完善农村文化基

础设施网络,有效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建好用好农家书屋、文化礼堂、乡村戏台等场所,建设基层综合文化服务阵地,避免设施空置、功能虚化、配套滞后,筑牢均衡发展的硬件底座。开展符合农村受众群体特征和选择偏好的文化活动。例如,在多地开展的“村晚”“村BA”等“村字号”文体活动,吸引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受众群体文化偏好相匹配,确保直达基层的优质文化资源真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进城”与城市优质资源“下乡”,在城乡联动中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双向赋能。例如,山东日照打造“社区文化书院+乡村文化小院”,开展“四季村晚”“社区文艺展演”等活动,精准化、常态化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构建协同生态,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度。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方协同体系,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沉下去、留得住、用得好。强化政府统筹协调职能,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向群众聚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解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准入门槛高、参与渠道窄、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深化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将文艺演出、数字文化服务等项目纳入常态化采购,面向社会组织、专业院团、文化企业等开放市场,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引入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例如,河南省周口市坚持10余年开设“周末公益剧场”,探索“政府主导、公益性质、综艺形式、签约化演出、社会化投入、品牌化发展”路径,通过企业冠名、联办专场等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完善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主动投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

## 『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

陈和香

## 思想纵横

## 有的放矢

## 专题深思